

一本晚出了五十年的书

胡
绳
著

應讀散記

学术随笔文丛

這理有甚道理。
 這裏的理，乃是偏於接受，以「這裏的
 所謂理是偏於接受而達以。要是指陸象山人
 的理說，則象山人所認識的理，乃是「指
 自己以理說而達於外，而不自知理之為
 理」。

37
12

一本晚出了五十年的书

應讀散記
切記

学术随笔文丛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读散记：一本晚出了五十年的书/胡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2

(学术随笔文丛)

ISBN 7-5004-1957-0

I. 夜… I. 胡… III. 随笔-中国-当代 N.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6304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4.5 插页：3

字数：85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9.50 元



一九四八年在香港

江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書刊審查意見表 三十一 一九五八年八月	書刊編著者 蘇聯政治講話 新哲學家的生觀	出版處 外國人工出版社 上海生活書店	出版年月 二十七年四月	內容摘要 敘述蘇聯時代農村及工廠之痛苦情形與十月革命後無產階級鬥爭兩次五年計劃之完成及蘇聯共產黨底結構等	審查意見 該書雖係敘述蘇聯革命前後之政治經濟之革命過程第二節十月革命後無產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專政之原因與重要其第八講結尾并有煽動世界革命之言論尤屬不妥實無詳述之必要	擬予 查禁	全 右	備 法	日
-------------------------------------	----------------------------	--------------------------	----------------	---	---	----------	--------	--------	---

国民党书刊审查机关对于《新哲学的人生观》审查意见

學習魯迅的文體

學習魯迅先生是紀念魯迅先生的最好辦法。從魯迅先生的為人與為學中間，的確有很多東西可以學習，在這裏我們只提提最一般，就是學習魯迅先生的文體。

魯迅先生的文體以精練鋒利為特色，這種文體的最具得的表现便是魯迅的新文。這其中國近代文學中的奇寶，不但時無二，而且直到現在為止，我總還不能說復刻未者。

然而我們必須為他。

一定文體必然地適應於一定的內容上。魯迅先生之所以能顯露出那樣的文體是由於他對現實的深刻而週密的洞察，因而他能從中見大，而偏絕全；是由於他對黑暗與醜惡的絕不調和的態度，因而他毫不放鬆地用一切可能方式加以指擊，是由於他對光明前途的信心也熱誠，因而他愈到晚年，他對於黑暗的指擊中愈是表現得生龍活虎；是由於他有廣博的學識而不銜字，因而他能隨意取材，左右逢源；倘不從這些基本點上學起，而只是形式

国民党书刊审查机关审查《夜读散记》时打的黑叉

前 言

60年代初，有人告诉我，在南京第二档案馆有我的一些手稿。当时我猜想不出来那是一些什么稿子，为什么会存放在档案馆。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10年里，我当然不可能过问这件事情，“文革”后的多年间，一直没有到南京去。直到1994年3月，我才到南京，访问了南京第二档案馆。在档案馆的同志帮助下，终于弄清楚了这件事。这份手稿原来是我在1942年底编的一本文集，名叫《夜读散记》；是在1949年解放重庆后，从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机构所存的档案中发现的。显然，在1942年我是准备出版这本书，由出版者按国民党当局的规定把原稿送到“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结果原稿被扣押下来。所谓原稿，其实有些是杂志文章的剪贴，有些是我自己和别人抄写的。

5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一开始，我从上海到了武汉，在武汉沦陷前夕，从武汉到了襄樊。1939年夏天又离开襄樊到达重庆。到重庆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的主要工作是主编在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月报》，并且还在邹韬奋主持的《全民抗战》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1941年初，随着“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国民党地区内的生活书店等进步的文化机构，遭到很大的破坏。整个政治形势有急剧变化的

可能。这时候，党组织为保护文化界进步力量，让许多在文化界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朋友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到香港去，在那里继续尽可能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我们又从香港退回内地。我再次到了重庆，在党的《新华日报》工作。

这时，生活书店只剩下在重庆的一个分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其他许多地方的生活书店都已被国民党当局查封。重庆的分店只有售书的门市部，自己不出书，也没有编辑部。但是分店的负责人觉得还是应该出几本新书，就要我帮忙，为他们找书稿。记得这时我曾为此去信给在昆明的吴晗教授，他寄来一些近年在报刊发表过的谈论历史的文章，我为他编了一本书，名为《历史的镜子》。我自己的《夜读散记》也是在这时编出来的。《历史的镜子》由生活书店出版了，而我的这本书稿却被扣押在国民党审查机关里，直到1949年后进入我们的档案馆。

我的这本书所收的是从1939年秋到1941年初在《读书月报》和《全民抗战》这两个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抗战时期，1939年起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区内实行原稿审查制度，所以这些文章最初陆续发表时，都已经通过审查。但是到了1942年把这些文章汇集送审时，国民党审查机关的老爷们却不放过它们了。当时大概我对这本书稿能够通过审查机关并不抱什么希望，甚至是明知其命运不佳而送去的。我在做报纸刊物的编辑工作时，常常有意在送往审查机关的文章中摆进极可能被扣留的文章，以掩护那些较多

可能通过的文章。这也算是一种策略吧。这本稿子被审查机关扣留，当时既不出乎我意外，事后多年我也就把这件事情完全忘记了。

国民党的原稿审查制度，是在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转移到重庆以后开始施行的。这个制度规定，所有将出版发行的报刊书籍，都必须送审原稿。国民党当局之所以不实行出版物排好清样后送审的办法，而必须送审原稿，是因为要避免出现“开天窗”的现象。（如果把排好的书刊或报纸的校样送审，那么在出版物上，就可能出现一些被检查官删掉的空白，这就被称为“开天窗”。）为什么要避免这种现象呢？当然是因为虽要审查出版物，但又怕露出痕迹的缘故。所有出版物都要进行审查后才能出版，表面看来，审查工作量是很巨大的。但其实并没有多么繁重，因为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民间的出版事业已极度萎缩，而对于国民党官办出版物的审查，当然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南京档案馆在给我复制《夜读散记》原稿时，也复制了一些从抗战时期国民党审查机关的档案中找到的有关我的材料。如这里面就有“国民党江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送到重庆去请求批准的文件“赣处二八二〇号”，其中写道：“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胡绳著《新哲学的人生观》内容有违审查标准，拟予查禁。”这本书是早在1937年上半年抗日战争前就在上海出版的，这时江西省有个出版社想再印这本书，所以送审。重庆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江西的审查官的意见表示同意，并写道：“查该书内容确系立论偏激，不满现实，触犯审查标准乙项第五条之规定，批

准予查禁。”还对审查结果下判语说：“该书以通俗笔调鼓吹偏激思想，全书主旨在阐述确定人生观须以唯物论做根据，以唯物论辩证法做准则，有违审查标准。”由此可见，不仅新书的原稿要送审，而且民间出版社要重印一本已出过的书，也要送审。而且对已出版的书也有查禁的。1943年6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上半年查禁图书一览表，列举了当时查禁的几十种图书，查禁的方式分为：“就地取缔”、“停止发售”、“不准再版”、“不准付印”等。其中，列举的书第一种是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而我的《思想方法论》和《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均有幸被列入。

从《夜读散记》稿本中，看不到审查官对这本书表示什么意见。但仔细看后发现，在书中《学习鲁迅的文体》一篇文章上，有浓浓的墨笔画了几个大叉，这显然是国民党检查官留下来的痕迹。在《谈读历史》一文中，国民党检查官还特别注意到“其实并不是历史使他糊涂，而是糊涂的人把历史弄得糊涂了”一句话，他也注意到在《鲁迅的教训》中引用鲁迅的话“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这两处都留下了检查官画上的黑杠子。还有《言语和情绪》一文其实并无深意，但文中最后“以为消灭言语就是消灭情绪，那实在是愚蠢的打算”旁边，也被标有黑黑的墨道，显然这句话也特别引起国民党检查官的注意和警惕。检查官在书中留下的这些痕迹，是很有趣味的，或许还能引人深思。

以上这些事情说明，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小书，本

来是 50 年前就应该出版的。

因为是 50 年前要出版的书，为保持它本来的面貌，所以现在出版排印前，我对这本稿子没有做任何变动。其中有些话可能说得不很恰当，甚至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但也不再加以改变。读者明白，这是半个多世纪之前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的作品。《夜读散记》中所记引文的出处，都是一些旧版本的书刊，这次均未做变更。还须说明的是，1991 年曾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胡绳文集（1935—1948）》，《夜读散记》中有半数的文章曾编入那本文集。

1995 年 3 月 30 日写于武汉东湖

同年 4 月 20 日在襄樊改定

目 录

前 言	(1)
诗与真实 (代序)	(1)
新的中国人与新的中国	(4)
战争与文化	(13)
疲劳与麻木	(20)
国家与文化	(27)
论英雄与英雄主义	(33)
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	(42)
论向前看与向后看	(52)
谈理论与研究与文学欣赏	(58)

读 书 笔 谈

认识中国	(66)
平凡的英雄主义	(69)
学习鲁迅的文体	(71)
谈读历史	(73)
新年致辞	(76)

二月偶记	(79)
谈学习	(82)
关于数字	(85)
怎样讨论问题	(87)
学与思	(89)
迫害与献媚	(91)
鲁迅的教训	(93)
辞旧迎新	(96)

夜 读 散 记

笛卡尔的方法论	(98)
反复古论	(100)
“民心可用”	(102)
禁书	(105)
必然与偶然	(107)
林则徐	(109)
幻想与真实	(112)
奇怪的逻辑	(115)
异教徒	(118)
蜘蛛、蜜蜂和蚂蚁	(121)
程万里的故事	(123)
言语与情绪	(127)
信徒与敌人	(129)

诗 与 真 实

(代序)

正如哲学在古希腊所处的地位一样，文学在中国也曾是作为一切精神活动的总和的。

我们自然不能把在中国古代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文学的优势，但是文学排斥一切的现象，使得人们在咿唔吟哦之余才能想到经世济民之学，这确是中国之所以被称为“文字之国”的一个理由。——然而由此而归罪于文学还是不公道的。当我们历数中国民族的伟大历史遗产时，我们仍然不能不举出这许多名字：屈原，杜甫，李白，马致远，曹雪芹，施耐庵。他们都是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最高峰而屹立着。

要脱去文字之国的诨号，当然并不是要抛弃文学，于是人们渐渐把文学与科学分离开来。然而这种分家实施到极点却表现出了精神活动上的一种病态。为什么？因为一切的精神活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绝对地划分开，使科学走科学的路，文学走文学的路，乃是不可能而且有害的事。

这种分离就使得人们以为文学乃是在求美，而科学则

是在求真，真与美对立起来了。

固然如大家所知道的，文学是要反映现实的，这也是求真，然而倘仅为浮面的刻画，则必不能达到“真”的要求。脱离了科学的认识，则文学中的“美”是浮雕的，空虚的。

科学的目的固然是在求得一切事物的真象，然而科学不只是为了解释一切，而且为了改造一切。科学家必须有好恶，有爱憎，脱离了文学的热诚，则科学中的“真”乃是轻浮的，无生命力的。

因此诗人常需要有科学家的冷静的头脑。而科学家也常需要有诗人的丰富的感情。

我们必须遵循歌德的不朽的命题“诗与真实”(Wahrheit und Dicht)，而在文学与科学之间建立密切的结合。歌德的话只是对诗人而言的，而我们可以把这话运用的范围更推广一点。在诗人方面是以诗为主体而构成诗与真实的统一，在科学家方面是以真实为主体而构成真实与诗的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或许在一般人看来是性质绝对相反的两部著作。前者被视为是硬性的，好像是非准备头痛不能去读的；后者则被视为软性的，可以用享受的心情去读它。然而从其以无限热忱批评现实，展望未来这一点上说，《资本论》也是诗的。而从其以锋利的笔刃解剖着十九世纪初年的俄国社会中的生活与思想这一点上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乃是科学的。

因为无论是科学还是诗，都是现实的反映。现实中有着诗，也有着科学。脱离了科学的诗是无病的呻吟，脱离了诗的科学是木乃伊。

当前中国的伟大的现实正是伟大的诗篇。惟有深刻地了解现实，才能以深厚的信心来眺望前途，歌颂一切；而惟有以无限热忱眺望着前途，才能深刻地了解现实，剖视现实。在这里无论是诗人还是科学家都可以无限地发展其创造力！

因此，我们号召一切思想界的战士们结合起来，打成一片！今天中国的人民需要科学，也需要诗。他们需要科学，因为他们不愿愚昧。他们需要诗，为了可以更大胆向前。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

偶然动了编本集子的想法，就把一九三九年秋到一九四一年初在重庆的一年半中所写的文章选出一些，编成这本小书。编成之后，照理应有一篇序言，但也似乎没有什么话可说，就把本拟收入这集子中的一篇短文拿来作序文的代替。

一九四二年岁暮

新的中国人与新的中国

——为抗战二周年纪念作

在血肉炮火与烽烟中间，我们已经度过两年的抗战生活了。

我们不曾如敌人所预计和希冀的，在短速的时期中即丧失战斗的意志。而我们也不曾如民族失败主义者（汪精卫之流）最初所预料的，在持久的战争过程中，一切都牺牲殆尽，毁灭殆尽。

是的，我们在战争过程中，经历了无数的牺牲与巨大的苦痛，但是我们不特从敌人那里获得了同等或更多的赔偿，而且仍有足够的力量再继续打第三年、第四年……这样打下去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已毁灭殆尽，也不是为了与敌人同归于尽，而是为了胜利！

两年的抗战完全证明了：我们一方面在抗战中受牺牲，被破坏，同时又在抗战中产生了发展了新的力量。这种与破坏过程同样进行的新生过程是我们的敌人所看不到的，是一切投降主义者、民族失败主义者所看不到的。

检讨过去时期中抗战的收获，我们必须重视这新的力量的产生。在两年的时期中敌军大量地被我们杀伤，敌国的